

海派文化之我见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

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

HAIPAI WENHUA ZHI WOJIAN

SHANGHAIDAXUE HAIPAI WENHUA YANJIU ZHONGXIN
SHOUJIE XUESHU YANTAOHUI WENJ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届
学术研讨会文集/方明伦,李伦新,丁锡满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7

ISBN 7-81058-607-6

I. 海... II. ①方... ②李... ③丁... III. 文化—
上海市—学术会议—文集 IV. G127.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2042 号

责任编辑：崔泽英

封面设计：王春杰

责任制作：张继新

责任校对：张 懿

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

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文集

主编：方明伦 李伦新 丁锡满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149号 邮政编码200072)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56311131)

出版人：李顺祺

*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插页 2 240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8.00元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尤其在与给人以正宗和传统印象的“京派文化”相对照时,其所蕴涵的时髦(或曰“现代”)、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就更加突出。目前,上海正致力于国际大都市的建设,致力于发展出“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个文化底蕴是不行的。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宗旨,正在于对“海派文化”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研究,以彰显“海派文化”的特有魅力,服务于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

中心立足上海大学,但又不局限于上海大学,而是致力于整合各种研究力量。

中心目前建制情况如下:

主 任: 李伦新

副 主 任: 方明伦 丁锡满

秘 书 长: 王 蔚

副秘书长: 唐长发 陈少能

“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简介

“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研讨会”于 2002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大学乐乎新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会议由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作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大学文学院顾问李伦新教授主持，上海大学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方明伦教授致开幕词。来自上海及国外的专家、学者、作家钱谷融、徐中玉、贾植芳、丁锡满、邓伟志、叶辛、程乃珊等出席了开幕式。在随后进行的“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海派文化的渊源、内涵与特点，海派文化在戏剧、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上的诸多表现，海派文化与上海人、当下研究海派文化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并对今后如何将海派文化发扬光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开 幕 辞

(代序)

方明伦

尊敬的各位嘉宾、学者：

今天，上海大学“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我谨代表学校和钱校长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上海大学立志要建成国内一流应用研究型大学。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来说，特别是对人文、社会专业如何落实“应用研究”这一思路，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试验的重要课题。今天，“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的召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可以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与关注当下社会之间探索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

说到底，我们不是从功利角度来理解“应用”这两个字的，具体到人文学科来说，它更多的是强调体现一种面对现实生活的研究气度和学术眼光。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期待中的“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学术研讨会”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最基本的，它可以引导海派文化研究朝着更专业的方向前进。“海派文化”这一文化现象尽管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引起了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关注，但直到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海派文化研究还未能形成规模。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希望改变过去相关研究领域里那种零散性、间断性的研究状况，从而使其能步入专业化、持久性的研究格局中来。我们所理解的专业化、持久性不是强调集体性的操作方式，而是出于对这一课题本身的重要性的尊重——海派文化不仅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在 21 世纪恐怕也仍会如此！

当然，海派文化本身是一个极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海派文化的研究，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将引导相关研究向一个更健康、更有利的方向发展。这需要我们具有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能够以一切先进文化为参照，将海派文化研究推上不断成长

的、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其次,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也理应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大本营;今天,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虽然早已不是“海派文化”这一原有命题可以充分概括的,但它毕竟牵涉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也仍然与今天21世纪的这个上海城市有着某些或表面或深层的联系。也许就是这种历史“牵涉”和现实“联系”,使得“海派文化”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有可能焕发出新鲜的当代意义,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有益借鉴,甚至,就是这城市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人心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平,归根结蒂是这个城市社会经济和国民素质的综合反映。“海派文化”原本就具有极浓郁的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对“海派文化”内在精神的重新发扬和阐释,将对目前上海城市的建设和新一轮发展、对上海新时期多元的世界性的包容力的形成起到一种深厚的支撑作用。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海派文化研究的当下意义,也是我们愿意全力以赴支持“海派文化之我见——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首次学术研讨会”的原因。今天,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刚刚开始,我们期待着,借着这样一个空间,各位专家学者能将海派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上海大学也能借此在探索人文学科与社会现实的结合上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从更大意义上说,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能从各位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中获得某种精神资源。

谢谢各位!

最后,我祝愿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

目 录

海派源流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海派文化·····	丁锡满(3)
海派文化浅论·····	朱少伟(6)
海派文化札记·····	徐福生(12)
崧泽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源头	
——试论上海历史文化名镇朱家角兴起与海派文化之间的 内在联系·····	曹伟明(18)
为什么上海能成为中国近代的文化中心·····	袁 进(25)

传承与发展

试论海派文化在上海发展中的作用·····	严家栋(35)
海派文化的精灵·····	李关德(41)
要认识两点·····	徐开垒(50)
海派文化变革的五个阶段·····	邓伟志 邱靖妍(53)
海纳百川勇于创新 推进海派文化新超越	
——从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看海派文化新发展、新突破·····	朱芸芳(60)
发展“上海文化”，打造“文化上海”	
——让上海成为中国时尚文化的发动机·····	葛红兵(66)
上海都市文化中的品牌力·····	张祖健(69)

海派文艺

论述海上画派	邵洛羊(87)
海派文化之我见	李伦新(98)
漫话海派	阿 章(103)
寻找音乐的上海	陈 刚(105)
论海派戏剧的先锋性、包容性与局限性	曹树钧(109)
世纪之交的上海文艺	戴 翊(119)
论海派文化时空中的吴昌硕	王琪森(128)
与时俱进是海派戏剧的宝贵品格(提纲)	高义龙(132)
多元博采的海派文学	钱乃荣(134)

海派中的上海

上海,贵姓	程乃珊(145)
海派庙市文化初探	程秉海 姚铁生(151)
简论上海文化与上海人	杨剑龙(164)
性文化与性文化研究	刘达临(168)
由上海民间信仰个案分析看上海文化特质的意义	田兆元(176)

海派文化之我見

海派源流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海派文化

丁锡满

李伦新同志要我谈谈为什么要成立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为什么要研究海派文化？我搔破了头皮，拍肿了脑袋，想到现在还是想不出答案，只觉得需要研究，但是说不出为什么要研究。我的答案只能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要研究。

按照《辞海》的说法，文化就是文明，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都是做文化工作的，我们的工作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是我觉得，我们应当惭愧。我们有过光荣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甲骨文、青铜器，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有万里长城，我们有儒家思想，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我们曾经辉煌过的东西现在不再辉煌了，人家把我们发明的东西拿过去，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向人家学习。我们是文明古国，但现代文明起步很晚，跟人家差距很大。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上层建筑必须和经济基础相适应。黄菊同志曾经说过：“上海要成为国际大都市，文化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配套，文化发展一定要同社会发展相一致。”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但是精神文明还没有与社会发展同步前进，尤其是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外国。譬如说爱国主义吧，从“9·11”事件可以看出，美国人是多么团结，多么齐心，他们的爱国心真令人感动。中国人会那么团结、那么齐心吗？会那么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吗？有些中国人，有奶便是娘，不爱中国爱美国。像有个打篮球的名将，只要美国丢一块骨头给他，他就会爬在地上去啃。如果有一天美国军队打到中国来，我估计，汉奸可能比抗日战争的时候多。我到过许多国家，我觉得，中国人的思想素质和文明程度，总体上不如欧洲和美洲。国庆期间天安门广场留下的四十万块口香糖残渣就说明了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又譬如说贪污腐败吧，每个国家都有的，但是贪官的数量之多，贪污的数额之大，毫无疑问中国是相当可观的。腐败分子多就说明了中国人思想素质之低。

文化现象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江泽民，从“天

下为公”到“为人民服务”到“三个代表”，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都反映出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因为历史阶段的不同，口号就有时代的特征。各个地区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就不同，山西锣鼓与江南丝竹就有豪放与典雅的区别。各个民族文化也不同，蒙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就不同。各个阶级的文化也都打上阶级的烙印。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三纲五常”，我们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64 个字。

我们生活在 21 世纪的上海。我们经常说要创造中国风格、时代特征、上海特色的文化。那么上海文化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化来促进上海经济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为两个文明的建设服务呢？大家都说上海的文化是“海派文化”。什么是“海派文化”呢？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中，有一个代表是代表“先进文化”。文化有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之分。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什么是“先进文化”？哪些文化形态、文化现象是我们所提倡的，要扶植和发扬的，哪些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是我们所要抑制和反对的，这些都需要弄个明白，大体上取得共识，这样才能引导文化工作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听得比较多的说法是，“海派”就是“海纳百川”，“海派文化”的特征是兼容并蓄、吸收创新。以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绘画”，以连台本戏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石库门为代表的“海派建筑”，以“一品香”为代表的“海派西餐”，都是既有中国风格，又吸收外国文明而创造出的适合上海人口味、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就是因为有“海派”，上海要有更大的发展，也只有广纳博采外国文化的精华，继承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中西交汇、南北兼容的一种全新的文化。上海因为开埠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长，这就形成了上海人一个与众不同的特长：就是善于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和创造。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上海的门户开得更大了，外来的文化来得更多了，上海人的视野更加广阔了，上海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改革开放也像长江三峡放水一样，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就需要识别和过滤，需要引流和澄清。不能一见到外国的、新奇的，一律囫圇吞枣，照单全收。有的人以肉麻为有趣，以腐朽为神奇，以丑恶为美丽，画家搞“行为艺术”，商店搞“殖民文化”，令人作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都反映出，有些打着文化旗号的人，其实他的文化素质很差，文艺欣赏情趣很低，我们有责任加以辩证，加以引导，不让他们误人子弟。弄清楚什么是“海派文化”，什么不是“海派文化”，什么东西应该吸收，什么东西不应该模仿，这对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大有好处。这种辩证和引导，需要我们文化界去做。成

立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就是想把我们文化界的有识之士，热心之士动员起来，聚集起来，研究“海派文化”，弘扬“海派文化”，发展“海派文化”，使“海派文化”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上海的社会发展服务，为提高上海人的文明素质服务。

海派文化浅论

朱少伟

上海堪称长江口的璀璨明珠。它不仅属中国大陆海岸线最向东伸入大海的部分,还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从航运角度看,又几乎坐落于一自北美西海岸经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的世界环航线路最近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最有条件成为各种文化交流的枢纽。

远在唐代,上海地区就出现名闻遐迩的港口青龙镇(今青浦区旧青浦镇)。宋元以降,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上海由镇升县,更是迅速崛起;尤其值得一提,此时上海地区已以“文秀之区”饮誉江南。及至清代,嘉庆《上海县志》载:“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从中可见,上海早就得风气之先,并有着一定的文化积淀。

当上海跃为江南重要商业城市,并迸发巨大潜力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却遇到前所未有的变局。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年11月,西方列强觊觎已久的黄金口岸上海在屈辱中开埠。仅隔两年,这里便出现第一个租界——英租界。法国、美国进行效仿,相继在上海辟出法租界、美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从本质上说,租界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也是其对华实施政治渗透、经济掠夺的基地,但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不能完全决定效果:租界当局采取严格的市政管理方式和先进的建设手段,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城市近优化;租界内创办的教会学校、译书机构、外国报刊等,或多或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英租界、法租界起初合计长约10华里,被泛称“十里洋场”,后来租界疯狂扩张,竟拥有今上海老市区的大部分,与此同时华籍居民大量迁入。毛祥麟在1870年刻印的《墨余录》中记述,租界“里巷纷纭,行人如蚁。华民多设肆于中,

铺户鳞比”。到19世纪末,据统计租界人口已骤增至40多万,外侨约占1.6%,此外均为上海和来自各省的居民。长期的“华洋共处”、“五方杂居”,实际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南北文化频繁交汇的复杂过程,最终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融合。这种融合,即为海派文化产生的基础。

“海派”一词肇始于中国画。晚清,大批画家为谋生或避乱,纷纷携艺来到上海,使之逐渐成为绘画活动中心。黄式权在1883年刻印的《淞南梦影录》中提及:“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的有识之士发起组织画会,积极开展活动,如吴宗麟于同治年间兴办“萍花书画社”,吴昌硕等于光绪年间创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让来自各地的画家共同切磋技艺,相互取长补短。与此同时,西洋画也开始流行,如同治年间上海徐家汇出现的“土山湾画馆”,专门教习铅笔画、水彩画和油画。许多画家受到新风气的影响,不愿再陷于窠臼,他们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在中国画的传统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形成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海上画派,又称海派,主要代表有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需要指出,海上画派之名未见诸同治、光绪年间方志,这表明它和别的画派一样,并非自命自封,而是由异地同行先叫开;海上画派之名无疑与金陵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同构,但别出心裁拿掉其中间两字径呼海派,则既能看成简称,又可视作讥诮。据《清稗类钞》载:“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事实上,当时海上画派因破格创新、个性鲜明,往往被坚持“正统”的士绅阶层斥为浅薄、混乱。此种观念直至民国期间尚存,如俞剑华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同治、光绪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日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然而,海上画派对绘画发展的促进作用毕竟无法抹煞,“海派”终究成为美术界的专业化中性名词,正像孙杰在近年出版的《古代上海艺术》中所评价:“这是我国近代绘画史上影响最大的画派。”

“海派”的另一重要起源在戏曲。晚清,上海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出现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洋剧同地登台的情形。王韬在1875年刻印的《瀛壖杂志》中称西人演剧“衣裙四周缀级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相激射”,而且“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自海外来”。西洋“戏术”给人们一种新鲜感,也对流行上海的南派京剧产生影响。到1893年,池志澄撰写的《沪游梦影》已对“沪上梨园”如是描述:“各戏登场,万头攒动,蚁拥蜂喧。更复有以灯彩技艺擅长者如《凤莲山》、《洛阳桥》、《斗牛宫》、《宝莲灯》,每演一戏,蜡炬费至二千余条,古称火树银花,当亦无此绮丽矣!”这表明,此时部分西洋“戏术”融入了戏曲。

革命党人王钟声等为提倡“改良戏剧”，1907年在上海办起通鉴学校，并带领由京剧票友组成的春阳社公演新剧。1908年，在商界翘楚支持下，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昆仲等于十六铺华界创办新舞台，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新式剧场，也是上海戏曲改良的标志。新舞台摒弃老的戏园格局，将传统的三面敞开式舞台改为镜框式舞台，并装置灯光、活动布景，使台上既能展示山林旷野，又能显现曲院洞房，从而配合剧情增加观众的真实感。辛亥革命前后，这里相继排演《党人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拿破仑》、《黑奴吁天录》、《新茶花女》等新剧，使戏曲包容现实和西洋题材，由古装拓展到时装和洋装，从舞台虚拟变为充分运用机关布景。最终，在著名“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海派京剧呱呱坠地。应该指出，据《清稗类钞》称，早在此前京城的走红伶人便“呼外省之剧曰海派”，这显然是带揶揄的泛称；它被用来专指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京剧上海流派，则有了特定寓意。但无论如何，就当时相对代表传统文化正宗的京派而言，海派只能算作变异。

海派作为艺术流派滥觞后，很快从中国画、京剧漫开至电影、小说、美术教育等领域，乃至社会风尚、生活方式、言谈举止，积而久之，便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

二

海派近海，萌芽时遭到欧风美雨的猛烈吹淋。昔日租界的畸形繁荣，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为之发育提供了客观条件，一方面又使之容易赘附负面的东西。为此，上世纪30年代初期文坛发生了“京海之争”。

1934年1月7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海派”》，其中这样抨击：“‘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盛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慕渴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

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沈从文作为京派文人,在文章中虽然切中部分海派文人之时弊,但也明显带偏激,几乎一股脑儿将文坛的秽行都归结为海派。

对此立即作出反应的是曹聚仁,他于1月17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和‘海派’本来是中国戏剧上的名词,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落伍”;“海派文人无一不是,固也。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此种迂回的辩解,极为巧妙,也较易让人接受。

接着,徐懋庸于1月20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称:“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我以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海派文人,多半以稿费为第一目的,故‘投机取巧’、‘见风转舵’等丑态,诚不能免。京派文人,则或为大学教授,或兼政府官职,凭借官僚机关而生活,基础巩固,薪金丰厚,自不至如海派文人那样之穷形极相,故亦不必‘投机’、‘看风’”;“商人和名士都要钱用。但商人用的钱,是直接地用手段赚来的,名士用的钱,则可来得曲折,从小百姓手中出发,经过无数机关而到名士手中的时候,腥气已完全消失,好像离开厨房较远的人吃羊肉一样”。这也是间接的反驳,可谓十分机智。

在唇枪舌剑中,《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主要阵地,一些文艺刊物也有所介入,相继亮相的重头文章还有沈从文的《关于“海派”》,曹聚仁的《续谈“海派”》,苏汶的《文人在上海》,青农的《谁是“海派”?》,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师陀的《“京派”与“海派”》,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仰孟的《大学生与海派》,韩侍桁的《论海派文学家》,姚雪垠的《京派与魔道》等。这场汇总对京派、海派种种看法的论争,虽然持续时间不算太长,但却异常激烈,结果弄得京派、海派都“灰头灰脸”,以至高潮过后仍有余波。

当时,鲁迅很冷静地看待“京海之争”。1934年2月3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这段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阐述,是最超然公正